

(法)皮·邦·德维尔马雷斯特 著

松

林

译

苏联间谍在法国



群众出版社

苏联间谍在法国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六九年)

(法) 皮·弗·德维尔马雷斯特 著

松 林 译

(内部发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P. F. DE VILLEMAREST

L'espionnage soviétique en France

(1944—1969)

本书根据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

苏联间谍在法国

(法) 皮·弗·德维尔马雷斯特 著

松 林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90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76 定价：0.95元

(内部发行)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皮·弗·德维尔马雷斯特是法国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对苏联的间谍活动有专门研究。本书叙述了1944年——1969年苏联在法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况。内容分三部分：一、1943年——1957年法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提供情报，苏联在法国建立情报网；二、苏联通过波兰、捷克、东德、罗马尼亚等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况；三、苏联间谍活动的特点。作者虽然思想反动，对共产主义不少诋毁和谩骂，但其所叙述的案件大都是真实的，对于苏联及东欧国家在法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况作了生动的介绍。并以翔实的材料，说明当代间谍活动的特点、范围，搜集情报的一般手段；指出，过去那种以军事行动为目的的狭义的间谍活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间谍活动是包罗万象的，从一般的工业生产情况到个人的隐私都属于收集的范围。本书对于了解现代国际间谍的斗争情况有一定帮助。

前言

读者看了本书的书名可能以为这是一部论战的著作，但决非如此。法国情报机构走过了一段复杂的历程，特别是一九四〇年失败后^①，机构分崩离析，人员各奔东西，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使情况更加混乱了。了解这一历史进程是完全必要的。解放后^②，法国谍报机构重新集结并进行了改组。改组是缓慢的，充满着矛盾，不断遇到人事纠纷，特别是机构政治化等障碍。政治化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一时“气氛”的变化，后果也就日益严重。在虚幻的“民族团结”的口号下，政府各部，直至间谍、反间谍机构和安全机构招收了一批军官、公职人员或特工人员，其中一些人由于本人来历的缘故，总是把法国同某个“制度”联系起来。这个“制度”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二月的“布拉格事变”^③，一九五六年对匈牙利的武装镇压，一九六八年对捷克的第二次入侵，一九六九年对罗马尼亚施加的压力等等，都表明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维持和幸存下去，全仗它的警察和军队。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德国法西斯。——译者

② 指希特勒被战败，法国结束了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占领。——译者

③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中，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发动政变，在苏联干预下被挫败。2月25日成立了由哥特瓦尔德提名的新政府。——译者

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将近四年里，法国共产党人分享着政权，连最机密的机构中也有法共的人。法共部长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苏联及其谍报员的庇护所，向他们提供了进入我国机关、工厂、实验室和军火库大门的钥匙。后来，人们看到，一九四七年之所以没有发生法国的“布拉格事变”，应归功于那些同极右派毫无共同之处而当时又面临困境的领导人所采取的坚定态度。当然，这也是美国暗中保护的结果。此后，某些法国人为了制止在我国日益发展的颠覆活动，过于热衷于同英美盟国的谍报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和它们协调行动。然而战后的法国已经再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帝国。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人们对我国历届政府缺乏信任，有些人又惯于贪污、受贿、投机钻营，其特点是，他们以具有哲学倾向的国际主义借口来掩盖这些伎俩，因此许多丑闻也就应运而生了。

尽管如此，法国解放初期，以及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即法国“卸掉阿尔及利亚包袱”后的岁月里又出现的政治气氛，都为苏联、苏联卫星国和亲苏共产党在法兰西国土上建立、发展间谍网，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了方便和合适的土壤。

本书点了许多人的名。我们并不是说，在他们办公室里或者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有意搞的。我们只想说明，通常是由于他们参预国家事务时眼光极为短浅，有些则出于性格软弱，才发生了这些事情。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不善于对付某些手腕，甚至是满不在乎的！这些手腕都是经过老谋深算，而且是六亲不认的。我们的敌人，无论是“合法分子”或“非法分子”，都是精于此

道的。

所谓“合法分子”就是那些披着合法“外衣”的谍报机构和反谍报机构的军官和干部。他们的公开身分可以是：负有“合作”使命的大使、领事、外交官、科技人员、艺术家、商务专员等等。只要他们仅以睁大眼睛，伸长耳朵，或诱使其谈话对象打开话匣子等办法来搜集材料，那么法律就是无能为力的。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他们受到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享有使馆和外交邮袋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他们的手脚必须相当干净利索，才能不被人当场抓住。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次接触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取得了成功，所以也就不便再交给别的技术人员来办。于是，开始了短促的秘密约会，特别是“隐蔽信箱”（树上的窟窿、公园的死角、墙缝）的办法：一方把“要求”放进这些地方，另一方随后悄悄地把“答复”搁下。这就产生了风险，不少人被当场捕获后驱逐出境。

所谓“非法分子”，是伪造身分派到国外的人。他们混在工厂工人、职员、手工业者、商人和难民之中，通常是默默无闻地潜伏多年，制造一副安分守己和经得起查实的假象。有些人还要求加入侨居国的国籍。在国籍问题上，半世纪来，法国是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国家之一。多年潜伏后，他们着手开展活动，执行他们潜入我国时就已确定了使命。

还应该对谍报机关的军官和谍报员作一区分。前者不仅要技术熟练，而且要具有十分高尚的品德。法国解放初期，人们对这一点太不注意了，因此让许多亡命之徒混进了我们的谍报机构。勇敢的战斗员、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光荣的游

击队长，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谍报军官。有些人可能来自某一个经过考验的爱国政治团体，但这不等于他们具备了从事这一要求很高而且是残酷的职业所应有的条件。皮埃尔·诺尔^①曾引用德意志帝国军官所说的一段话：“谍报工作是一种高贵的职业。”因此，必须发掘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着坚强的意志，不因其工作特殊而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苏联有二百多所学校负责挑选、培养和考察谍报军官人选。这些学校的负责人一直有权到各类学校和院系进行审慎的调查，物色那些可能成为他们学生的人材。法国不搞这项工作。一九五七年底，保尔·格罗森将军接管法国“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时，曾想把部分预算用于建立这类学校，并建立一种在我国大学里物色“人材”的制度。但是，那时候，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以后，没有人理解将军的这一考虑。然而，正因为谍报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是项技术性工作，而在执行时又常常是件肮脏不堪的事情，因此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办事十分认真才行。

关于它是一项技术性工作问题，法国领土监视局^②总专员马·让·保·莫里亚最近明确向我们指出：“目前向谍报人员提出的问题中，只有一个是纯粹政治方面的，五个是军事方面的，十个是工业技术、经济和科研方面的。”

至于谍报员，他们不是自己培养，而是就地招收。苏联

① 皮埃尔·诺尔 (Pierre Nord)，1939年——1940年任法军情报军官，1941年在“战斗法国”反法西斯组织中工作，1946年后从事文学创作。

——译者

② 法国的反谍报机关。——译者

的做法是，有些谍报人员由法共这方面的专家在其支部中物色，并由他们直接控制，然后把情报传递给苏联。有的则安插在党外，由其他“联系人”予以掌握。还有一些是从在法国多达三百万之众的外侨中招募的。最后，是从各政党、团体、俱乐部和苏联同情者中间，或者偶尔也在同商人以至妓女接触中，钓到的“游鱼”。以上几种人又同其他“非法分子”汇合在一起。

在谈实质问题前，还必须指出，共产党的间谍机构和西方间谍机构之间有着重大区别。对苏联及其盟友来说，谍报工作不仅是防御性的。它不只是想得到对方的军事计划，新式武器和先进技术，以了解对方的意图和拥有的手段，而主要是进攻性的，并且具有政治目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地、普遍地进行现代间谍活动的国家。苏联认为间谍工作是国家机器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军事参谋部的作战手段之一。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列宁以来的一切都是站得住脚的。因此，既然莫斯科领导人认为自己是世界革命的先锋，是一部庞大机器唯一的、高度集中的中枢，而这部机器在各国的支队应该象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七年，甚至在一九六九年，继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后所强调的那样，逐步地领导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还有别的做法呢？

政治性和进攻性，这就意味着苏联的谍报工作不仅含有战略意图。它想方设法打入外国国家机器内部，其中包括政府各部、机关、市政府、公共事业单位、实验室、私人企业、通讯社、报社、俱乐部、学术团体等！真是包罗万象。

它的渗透领域经常扩大，甚至包括与民族生存攸关的部长、高级官员、学者、工程师和政客的私生活、个人活动和心理状态诸方面。它在那些可以对上司或亲友施加影响的办公室主任、经济学家、新闻记者、银行家、企业家的周围布下了罗网。

由此可见，对于天真无邪地以“缓和”为名，要求对苏联实行“开放”政策，同苏联“对话”，随即进行合作的人来说，这里存在着危险的差距。一位访问苏联的法国人士，对自己的谈话对象除了某些大体可靠的印象和趣闻外，几乎什么也不了解。对他逗留的地方和要参观的那些企业，除了尽人皆知的情況外，也一无所知。犹如第一次到巴黎看到花花世界的拉斯蒂涅^①一样。反之，派到我们这些国家来的苏联人，无论短期逗留还是常驻任职，事先都了解他们要大显身手的那个地方的“地形”和对象的特点。他们可以看到必要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近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合法分子”、“非法分子”和当地的共产党又经常送来新材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修改和补充。来访前，他们不仅要了解各部、工厂和企业的组织结构，还要知道他们将会晤的人物的地位、性格、爱好和隐私。

对所有西方人士来说，每到苏联旅行一次，都是一次新发现。而对任何一个苏联人来说，到法国一趟，却是对已掌握的情报进行补充。当然，这样做，并不能避免发生估计、

① 拉斯蒂涅 (Rastignac) 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青年野心家，初次出现在小说《高老头》中。他从内地到巴黎，一心往上爬，遇到的却是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译者

分析上的失误，甚至发生工作中灾难性的事故。然而，即使如此，好处还是有的，因为总不是人生地不熟吧。这些人情报活动成果如何，主要是靠那些已经相当丰富的资料，再加上偶然因素。

譬如，早在一九四三年之前，苏联在加拿大和美国就有间谍网了。学者邓福德·史密斯的助手之一曾向史密斯探听盟国研究雷达防御系统的进展情况，史密斯回答说：“这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在核物理方面所从事的研究要比这有兴趣得多……”数星期后，十一名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以参加“租借法案”的谈判为名，来到了加拿大和美国。其中一些人的实际使命是充实新特务网，指导和加强它们的工作，以了解盟国的原子秘密。这帮人中有一个叫谢尔盖·库德里亚切夫的人，十八年后成为驻古巴大使，一九六八年又被任命为驻柬埔寨大使，其间，曾发现他在波恩担任过低一级的职务。另一个名叫维·巴甫洛夫，是揭发原子能谍报网的苏联机要员伊戈尔·库增科的上司，他对巴黎很熟悉，最近几年化名鲍里斯·凯德罗夫，在波恩活动。

邓福德·史密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那番言论可能造成的后果。本书作者曾在一次政治性晚宴上遇到一位法国学者。他也想象不到，如果在一九六七年这次晚宴的同席客人中有一个苏联特务的话，他的讲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满以为是在朋友之间聊天，信口发表了反戴高乐主义的意见，埋怨自己研究所派往莫斯科的一位女助手太多嘴多舌了。无疑，她在夸夸其谈时是会无意泄露部分最新机密的。无疑，那些在法苏“合作”范围内派她去莫斯科的人，对自

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清二楚的！什么样的机密呢？没有人问。可是，这位学者自己却继续发挥下去。他当场解释说（这件事今天可以公开了，因为专业杂志最近谈到它），他的小组发明了一种陆地与深海潜艇建立无线电联系的技术。美国 and 苏联当时都还没有掌握这一超过一定水平的技术。他这么一说，机密就在全世界传开了，外国特务便可以限定他们要调查的范围。在法国，搜集这种情报的耳目是不胜其多的，尽管人们常常认为间谍故事言过其实，或者只是那些说谎成性的小说家的无稽之谈。

腰插火枪、百发百中、出入舞会、同坏女人鬼混、在严刑拷打中英勇不屈、汽车飞驰、紧紧追踪、枪声阵阵，这种间谍的形象当然只是廉价电影中的镜头和场面而已。这里，人们把间谍和反间谍人员混为一谈。首先，优秀的间谍，除了机智和技术手段外，并没有武器。至于反间谍人员和负责消灭对方、叛徒和有开始叛变嫌疑者的“除奸人员”，事实上也是有的。但这是一些很少出场的专门家，并不住在他们要突然采取行动的地方，而且他们往往还是借手那些从不三不四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亡命之徒。在这类事件中的确有死人的事，但要比人们传说的少。然而，一九六八年联邦德国情报机关中刮起的“自杀”风，倒也不是什么秘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也是事实。一九六八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职的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青年驾驶汽车在巴黎一片密林的拐弯处着火焚毙；一九六九年六月，一名捷克退伍军官在巴黎近郊被“强盗所害”，这些也都是事实。一般地说，这种事往往

意味着某一个间谍网活动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个早已建立、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间谍网已经起来接班了。

也有一些涉及女人的事件。但是，想在阅读本书中度过色情的甜蜜夜晚的人，将会对本书感到失望。几年前，作者在对此类事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曾会见过几个想与玛塔-哈里^①媲美的女人。有一人曾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德国谍报局在阿拉伯中东的头号女间谍。她秘密居住在上巴伐利亚，正在寻找其隐姓埋名的前上司。她叫贝尔塔。贝尔塔是我们父辈在一九一七年见到的那种火炮的名称。虽然看到她聪敏过人就会把她干过的其它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她取这样一个名字还是很合适的。另一个是从德国秘密外逃事件（经奥地利或瑞士，通过布伦纳山口、赞克特-玛加丽腾等地，到中东或南美）的组织者之一。她是工人的妻子，居住在奥地利布雷根茨的贫民区。她有两个儿子，曾是希特勒的德国武装部队的军官。其中一个一九四七年在印度支那打过仗。另一个在大马士革当教官，一次他到欧洲“休假”时，在慕尼黑的公路上被暗杀。报纸报道说这是一次“车祸”。事实上，他车上有一只装满秘密文件的皮包，他的车同另一辆车相撞时，皮包不翼而飞了。这件事，报纸从未提起。那是一九四九年，当时为东方服务的一些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打进了他们西方兄弟们的谍报网和交通站，企图取而代之或者把它们破坏掉，同时准备向叙利亚扎伊姆上校及其继承者施舍克里^②以及纳赛尔中校的周围进行渗

① 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的德国女间谍。——译者

② 扎伊姆(Zaim)于1949年3月任叙利亚总统。施舍克里(Chichakli)1951年11月任叙利亚总统。——译者

透。

当然也有那么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她们的美貌、智慧和冒险精神使她们同间谍案沾了边。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中，因为这方面的人士自命不凡，自诩政治敏锐，对所谓间谍事件掉以轻心。然而，大部分西方间谍机构不愿施用美人计。况且，西欧现在愿意干这种事的人也不多。在东方，女间谍较为常见。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谍报专家中也有妇女。有一个长期在法国自称白俄伯爵夫人的女人，以后在五十年代成了东德间谍学校的负责人。她叫纳达利·基洛琴科，她对自己国家的贡献，主要在于她的高度工作效能，而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另一个女人，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曾是一位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情妇，后来“流亡”到法国，悄悄地充当一位名流的“顾问”。但这是少有的例外，谍报工作主要是一项有计划、有步骤、平淡无奇、老一套，但也要求出奇制胜的工作。

为什么充斥各国报刊专栏上的“事件”，法国却可幸免于难呢？大约十五年前，一家幽默杂志用过这样一个标题：

“间谍活动？一场闹剧！”巴黎一家晨报的每日短评撰稿人直到一九六四年还怀疑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心脏内部挖出的间谍乔治·帕克是否有罪。他的论点是：第一，此人同撰稿人都毕业于法国师范学院。其次，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探听的？第三，他断言：“真正现代化的国防无秘密可言”，因为“恐怖的平衡”要求每个大国“大肆宣传其行动手段”，首先是核手段，以使潜在的敌人闻风丧胆！这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当代间谍活动一窍不通的表现，把心理战和秘密战混为一谈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次要的补充手段

之一。秘密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它是冷战通过其它手段的继续。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采用这些手段还是比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好。

法国领土监视局针对满腹狐疑的怀疑论者，于一九六七年为出国工作人员出版了一本题为《间谍活动？是一个现实！》的小册子。

许多法国人不相信有什么间谍活动，或者常常是在遇到肮脏得多但又恰恰根本不是间谍活动的案件时信以为真。还有一些人认为，戴高乐政府对苏联恢复了早在一九四四年就采取的合作政策后，我们就不受苏联政治的和隐蔽的侵略了。他们不知道，象瑞士和瑞典这两个在东西方间严守中立的国家，也从未能摆脱苏联及其卫星国的间谍活动。他们也不知道，莫斯科设有那么一个由恩·斯·扎哈罗夫将军领导的机构，专门负责苏联在其盟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和政府内部进行间谍活动。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任何奴才，任何朋友，任何同伙都是潜在的对手。至于准备“合作”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即使是戴高乐当政的法国（包括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时期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在巴黎执政期间），即使是一九六二年以后的法国（即法国重新接近苏联，发展到一九六六年同苏联签订协定和条约时期），都不能逃脱这一规律。

“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费迪南·米施克上校，战争期间曾在戴高乐总统私人参谋部负责研究作战问题，一九五八年底在其所著《原子战略的破产》一书中警告说：“许多法国人还在向往着自己国家同俄国携手并进的时期……这种愿

望今后已经完全失去它的现实意义了。只有那些脱离历史发展的人才会抱有这样的愿望……许多人还希望实现某种中立的折衷解决办法。希望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们忽视这样的事实：这场世界规模的斗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而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斗争……谁也不能保持中立。况且，共产党人也从未采取过中立的态度……”

以上这段话可作为本书的中心思想。只要莫斯科还在引用列宁的思想，苏联就不是俄罗斯。它不仅是一个帝国，它所追求的不只是捍卫自身的领土完整，不只是维持它对不愿再受其折磨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统治。它是一种制度，它一直在寻找着能够使它取得世界优势和摧毁意识形态与其不同的那个世界的机会和手段。它忠于一种有五十年历史的学说，这就注定它一定会这样做。任何后退，任何让步，都将意味着苏联自己充当先锋的革命会在它奄奄一息的发源地遭到彻底失败！可是在一九六九年，情况还没有发展到这等地步！

皮·弗·德维尔马雷斯特

一九六九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当政治气氛有利于敌人钻进来的时候

(1943年—1957年)

第一章	法国解放和从上层打入政权内部	(3)
第二章	打进警察和保安部门	(14)
第三章	苏联人在法国站住了脚跟	(26)
第四章	“红色乐队”重整旗鼓	(36)
第五章	法国幸免于苏联和共产党策划的一场政变	(49)
第六章	间谍和国防要害部门中的“泄密案件”	(61)
第七章	“将军案件”的几点情况	(73)
第八章	促使莫边府失守的间谍网和圈套	(84)
第九章	“工会活动家”和“政治——金融界人士”的渗透活动	(104)

第二部分

通过卫星国家进行间谍活动

(1958年—1969年)

第十章	动荡的十年	(117)
-----	-------	---------